



总书记回信中为何提到骨气和底气?记者独家专访《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

底气是文化自信 骨气是平视西方

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杂志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对办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提出殷切期望。

创刊于1951年5月1日的《文史哲》杂志,是一份在海内外人文学术界享有巨大声望的老牌学术期刊,它是学术发表的主要园地、人文学术潮流的引领者,更被学界视为学术风向标之一,在海内外深受尊重和推崇。近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专访了《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看这份“新中国第一家高校文科学报”背后的坚守和理念。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首席记者 郭春雨
记者 田汝晔 李家澍

记者:咱从给总书记的信开始吧,是大家一起商议写的吗?

王学典:给总书记写信是我们编辑部集体的想法和请求。因为总书记特别关心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特别关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特别关心对中国道路和中华文明的研究。

《文史哲》杂志从创刊以来,就侧重于对中国古典学术,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最早启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探讨的一份杂志,是新思潮的阵地。

人生七十古来稀,《文史哲》创刊70年了,是目前国内时间最长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所以我们就想在《文史哲》70周年之际,向总书记汇报一下我们的办刊情况。

记者:收到总书记回信,是否出乎意料?能否谈一下你们的心情和当时的情况?

王学典:收到总书记回信的时候是5月9日晚上10点多,当时我吃完饭正在散步,接到这个消息后感觉非常振奋。第二天把总书记回信内容传回编辑部,编辑部都沸腾了,大家兴奋异常,上午召开集体座谈会,研究这封信的内容。这封信内容非常丰富,有对我们历史的肯定,也有对我们未来的期待,同时也面向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现状提出了期许,我们全体编辑用了整整一个上午来体会总书记的回信。

我感觉,高兴是一时的,压力是永久的,如何不辜负总书记的期待,不辜负学界的期待,不辜负社会各界的期待,这是我们压力的来源,也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记者:总书记为何在回信中提到骨气和底气?什么是骨气和底气?

王学典:在我看来,我们的底气主要是指我们的文化自信,来源于源远流长的中华五千年文明,中华文明“礼义”“仁爱”的文化主流从来没有变过,内核在发展中也得到了持续的丰富。中国人的底气就是中国人强起来了,体现在科学技术、国家的综合实力,以及我们所选择的独特的发展道路,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等方面。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现在中国终于强起来了。

“强起来”的中国,敢于在世界上表达我们自己的价值和追求,敢于提出我们的方案,我觉得这就是关于骨气的问题。我们不会屈服于任何外界的压力,西方列强欺负我们的历史一页已经永远翻了过去,现在我们可以平视西方。中华民族始终追求和而不同,大家庭的观念始终非常强烈,我们把整个人类看作一个大家庭,人类命运已经成为共同体,剩下的是这个大家庭如何相处的问题。

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会像其他国家一样想去当大家庭的家长,指挥其他成员,我们追求的是大家平等,在整个世界民族之林当中,大家的位置是一样的,应该各自享有自己的尊严,都有能力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从这个角度上讲,骨气和底气是个统一的问题,骨气来源于底气,底气是以骨气为基础的。

记者:现在有些舆论认为学科建设是象牙塔内的事,从回报社会、回报时代

的角度来说,学科建设的价值应该是什么?从这个角度看,学术评判的标准应该是什么?

王学典:这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特别关心的问题。我认为现在的哲学社会科学不理想的一个原因在于我们过于强调学科建设,而不强调学科转型,学科建设关注的是多少导师,多少学生,多少教授以及承担多少项目,发表多少论文等等,加快进行学科转型,需要从西方的学术轨道上抓紧转移到本土化的道路上来,将学科建设转型到本土化的道路上,我觉得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我国的物质极端丰富之后,财政对学科建设的投入也越来越大,很多人用这笔钱来建设和经营自己的学科建设的“安乐窝”。这种架构在“象牙塔”中的“安乐窝”注重论文、项目,而不愿直面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不愿意扑下身子,沉下去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调研,研究中国经验,研究中国的特殊的道路。我们总是介绍一位学者发表多少论文,从来没有有人问他的文章解决了多少社会问题。

一篇论文的影响因子能够解释中国社会吗?我们目前一些高校,包括几乎所有的著名大学,很少有人把社会科学的成果拿到社会现实中进行检验。包括研究经济学的一些学者,一些学者的经济学理论解决了多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具体问题?在研究理论上有哪些推进?有哪些原创性?我认为当前的主要矛盾应该是加快进行学科转型,而不是学科建设。

作为《文史哲》期刊来说,意识到学科转型的问题后,应该鼓励同事从事这些方面研究的学者,我们也确实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不是一个期刊能够解决的,但如果因为这是个大问题就都不解决,都放到一边去,那这个问题永远不会解决。

记者:“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一大批著名学者是在《文史哲》刊发了他们的处女作,成名作或代表作,这些“新作者”和“论述现实”的文章,如何筛选和选择?这么多年过去了,《文史哲》变了没?

王学典:没变,但是我们应该考虑新的现实,比如说发表在读学生的作品,本科学生的作品,这是上世纪50年代我们做的。当时我们处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面临的问题和任务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去置换在民国时期占主流地位的民国学术,面临的重点是学术转型。在学术转型之初,我们更看重一些新的东西、新的观点。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经过了70年的学术积累,已经取得了海量的学术成果。一个25岁刚毕业的青年很难把这些海量的学术成果消化掉,当然也有些杰出的青年可以做到,但毕竟非常少。我们对文章的选择也就有了一些转变,我们需要作者有丰富的文献积累和阅读,阅读是需要时间的,严格来讲在读的大学生难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也是在研究生毕业后,三十岁出头在《文史哲》发表了作品。目前我们对青年人的界定也在延伸,不局限于一些本科毕业或者研究生毕业的青年学子,我们对于作者,不管身份是什么,在学术上一视同仁,以质取稿,但是如果没有同水平的文章,我们还是会优先考虑青年学者,因为成名的学者代表过去,青年代表未来,扶持青年就是扶持未来,走向未来。



王学典向记者介绍杂志创刊人和历任主编,这些人撑起了山大文史最辉煌的年代,他们是《文史哲》的骨头。在泛黄的照片里,他们不曾老去,一直以年轻的样貌注视着时间的流转。

盛名之下,依旧保持初心

主编其人

《文史哲》最有名的还是主编王学典,他是国内顶尖的史学研究专家,著作等身。此次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也是他的提议。

王学典今年65岁,每个见过他的人都惊奇于他的眉毛,眉白如雪,长眉入鬓。黑发和白眉,在他身上呈现出一种奇妙的和谐,就像他本人给人的感觉一样:专注学术,又世事融洽。

虽然已年过花甲,但他的神态、记忆力、说话的语速都呈现出一份与年龄不相称的激情和年轻,和他谈话,要随时冒着“出冷汗”的风险,点评之犀利,让来采访的记者都不好转述下笔。

《文史哲》也不是在云端。每天都会不同的访客来拜访编辑部,王学典的时间被分割成了小小的每一块,谈话的时候会把手表摘下来放到一边,不露痕迹地掌握着谈话的节奏。

正是因为这种对世事的洞明和融洽,有王学典的《文史哲》编辑部,分割成两个融合又独立的部分。一部分,是累累荣誉所带来的掌声和聚光灯;另一部分,是属于编辑部的纯粹和沉静,一群潜心于学问的人,在这里找到了安静的书桌。

王学典老家是枣庄滕州人,父母都是农民,他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有三个弟弟。贫瘠的土地,困住了瘦弱的农家少年,但无法困住少年的心。

王学典的舅舅不识字,但却是非常有眼光的人,他告诉王学典,在很远很远的城市里,有很大的学校叫“大学”,只要好好学习,就能改变命运。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首席记者 郭春雨
记者 田汝晔 李家澍

最古老的查阅方式

从山东大学的南门进学校,穿过一片郁郁葱葱的白杨林,路过文学院灰色的老楼,再步行走上5分钟,就到了《文史哲》所在的知新楼。

这条路是很多学生从教室到宿舍的必经之路。一茬茬的学生从这里走过,每个人都是青春飞扬的年轻面庞。

再久之前,王学典也曾是众多年轻脸庞中的一张。他毕业于山大,而后在学校任教,再后来成了《文史哲》杂志的主编。

更早一点,闻一多、老舍、杨向奎等人,都曾是这条路上的年轻面庞。

岁月给了山大厚重,也给了《文史哲》厚重。

《文史哲》在山大中心校区已经几十年,这附近高楼建起来了,大商场建起来了,商业体林立,商铺换了一批又一批。

外面车水马龙,一派热闹和繁华。编辑部却还是保持了安静。虽然换了新的办公室,但以前的旧书、旧文件一件不落地全拿来了。《文史哲》编辑部现在有11个人,从30多岁到60多岁,年龄像阶梯一样递进,一岁一岁,一格一格,把编辑部撑了起来。

海一样的书籍,压在积了灰的桌子上,屋里的色彩饱和度很低。阳光射到这里有褪色的感觉,一股幽深静谧之感。

编辑李梅的办公桌在东南角,跟编辑邹晓东前后桌。上午太阳从窗户射进来,阳台上的几盆花享受着屋子里最好的光 and 空间。

“这些花基本都是我捡来的,”李梅的专业是古典文献学和文艺美学,她不到50岁,头发已经全白了,皮肤的状态却极好,在阳光里闪着光,“别人扔了,我就捡过来,养在办公室就活了。”

一篇文章投递到《文史哲》,要首先经过初审,通过初审后为了保证公平,要抹去作者信息盲投给专家,专家评审通过后再经过三审、三校,才会重新摆到编辑的案头,开始新一轮的编校修改。

“每一期杂志都会收到非常多的投稿,但实际上每一期能发表出来的就只有十几篇。每一篇稿件背后所付出的劳动量都非常巨大。”李梅拿出一篇正在学校的文章,密密麻麻地全是她做的修改和标注,一眼看去,密集细致得像绣花针的针脚。这里每个编辑习惯摸笔的手指都有点变形,这是几十年如一日伏案工作给身体留下的痕迹。

经过层层筛选后的文章,确有其闪光点独到之处,却也并不完善,甚至还可能蕴藏着多处错误和风险。编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一点点找出风险,补上漏洞。

电脑在这里的用处不大,因为对于严肃期刊的编辑来说,电脑上浩瀚的信息里藏着太多不



编辑邹晓东正在查阅文献。

《文史哲》编辑部的故事

变形的手指,无用的电脑以及睡觉的书台……

《文史哲》杂志70岁了,虽然几年前搬到了山东大学新的教学楼,但古稀岁月是布在历史上擦不掉的旧痕。习近平总书记给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是这本杂志最新的光彩。

书籍、文字,密密麻麻地紧塞紧在编辑部的每一个角落。各种证书奖杯堆了整整一面墙。《文史哲》主编王学典绕过这些荣誉,走到一排照片下面,给记者介绍杂志创刊人和历任主编,这些人撑起了山大文史最辉煌的年代,他们是《文史哲》的骨头,撑起了这本“我国目前刊龄最长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风骨。

70年岁月流转,学术的变化以及时代的变迁,都深深浅浅地在这本期刊上留下痕迹——但总有些坚持始终不变。



书籍、文字,遍布《文史哲》编辑部的每一个角落。

准确的风险。编辑们还保留着最古老的查阅方式——要查阅作者引用的某一处信源,需要编辑从浩瀚的书中,一点一点地翻阅,找到出处。

有时候为了找到一个出处,编辑要翻阅寻找几天,这是个极为缓慢且暗含着痛苦的工作。有些文章的作者年龄已经很大,有时候会记不清楚出处,需要编辑从大量的专著中找到一根小小的线头,并把这根线头拉出来,理清楚。

期刊上呈现出来的每一篇文章,脱胎于作者,成形于编辑,他们是作者和编辑共同抚育的婴孩,在杂志上重生,再被新的作者学习、引用并成长。

年轻人应聘时的反问

1982年出生的编辑邹晓东性格活泼爽朗一些,是编辑部为数不多有理工科学科背景的人。他本科是在山大读的物理学,读书时一些物理学难题困惑住了他,为了寻找答案,他开始接触哲学书籍。

“彻底陷进了哲学里,我没有办法。”邹晓东读完哲学的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还是找不到哲学的出口,他最终成了期刊的编辑。

邹晓东说,此前他理解的编辑是“给别人改稿子,作嫁衣”,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来《文史哲》应聘。面试时反过来向考官提问:“如果来这儿工作,我有自己做研究的机会吗?我自己的学术怎么办?”

年轻人莽撞又诚恳的问题,逗笑了王学典,“主编给我讲了很多事,解释说编辑工作和刊物本身都会倒逼着我去学习”。出于对主编的信任,邹晓东就留了下来。

编辑的工作非常严谨,刚开始不能独立处理论文,跟着其他编辑看、记、查,学了一段时间,他的工作变成求证,在堆成山的文献里找到可以证明的资料,他性子急,文献又多,心也焦虑——那时候老师们跟他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你不要急。

慢慢地,他的哲学研究打开

了新的窗口。漫长的求证过程,必须逼着自己深入下去。邹晓东形容说,这种状态就像是在打井,“能一直钻,钻到深处去”。

一天天过去,慢慢地,看到了编辑工作之美,学术之美,知道了怎么去跟作者打交道,也知道了哪些内容对于杂志和自己最重要。

学术之美,要深入进去才看得真切。李梅见过,她觉得学术之美,可以让人忘却时间。除了在办公室养着捡来的花,她基本没有任何休闲和娱乐。生活像苦行僧,经常做研究到凌晨一两点才睡,有时候实在太累,就看一集动画片作为缓解。

编辑部二三事

《文史哲》的编辑,可不是一群学究,正好相反,这里是寻常的日子,有琐碎的故事,以及文人的清欢。

已经出版了多本专著的李梅,也曾是看着看着哭了的人。读书时导师让她看黑格尔的《小逻辑》,她看不懂,急得哭。如今,曾经边学习边哭的李梅,已经成为副教授,要给学生讲述黑格尔,讲述古典文献、文艺美学。

曾经不想当编辑的邹晓东,现在已经在校刊上讲述自己的故事,对工作的评价是“很幸福”。他是个很能“因地制宜”的人,办公室里的书越堆越多,慢慢地就形成了个一人高的书台。因为家距离挺远,邹晓东就带了个毯子,做成了“书床”。书当枕头书做床,编辑部的时东武老师就挥笔题下“增广学台”的名字,意思是在这上头睡一觉,知识就能长不少。

时东武是个沉默腼腆的中年人,他喜欢写字,之前是练习钢笔字,后来在同事的鼓励之下开始练习毛笔字。在编辑部,时东武的字非常重要。除了春节贴的对联、福字,还有挂在门上的一张“精气神”,作用是同事上班挂衣服时“提提神”。

作为编辑部的“大管家”,办公室主任刘丽丽是所有编辑公认“核心人物”,她是学美国史的硕士,但几乎包揽了编辑部迎来送往、打印登记等一切事务性

的工作。

在编辑部,是听不见短视频声音的,倒不是编辑们不爱玩,“太费时间了,一看就半个小时过去了”,邹晓东有一阵挺迷恋短视频,只看鱼塘抽水抓鱼的视频,一连看了半个月,“看得实在没意思了,就基本没再打开过”。

编辑工作算不上清贫,但也不算大富裕,编辑们几乎每个月都要算计着买书的支出,因为这是个人消费中的一项“大钱”,编辑中最“有钱”的是孙齐,他是史学博士,一到周末,他就自己开车出门,名山大寺,荒山野庙里寻找,遇到心仪的碑刻就亲自拓下来,时间久了,就攒了厚厚的几箱拓片,向同事展示时颇为得意,“这非常有价值,特别值钱”。

编辑部还有一个“奇人”,孟巍隆教授,他是美国人,娶了中国太太,为了文化和爱情留在了中国。他是山大获得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的第一位欧美人,同时也是北大获得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位欧美人。当然,最传奇的还是他工作日是研究文史的编辑,周末则是巴西柔术教练,在济南的武术圈享有盛名。

日子一天天地过,编辑部大事很少,趣事很多。在编辑部工作了36年的刘京希,16年的李扬眉,曾经给季羡林审稿改稿的李平生,已经85岁的前主编韩凌轩;再往前,就是第一代编辑部人,华岗、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杨向奎、董业书、赵旭生、王仲举、殷焕先……编辑部的70年,一代代人在这里循环,就这样接力了下来。

采访结束后,记者跟着编辑老师们一起在校园走走。我们坐在小树林里的长椅上聊天,旁边是闻一多的雕像,头顶是高高大大的梧桐树,正因为时间足够久,树冠阔大,枝丫丫伸过来,遮蔽了夏日的阳光。人坐在树下,感觉很清凉。

年轻的学子从身边走过,刘培教授所带的博士,绕在他身边讨论一个有关文学和政治的问题,困扰着一个年轻的脸上。

一代代学生,从青涩到成熟,从困惑到深入,又一个轮回开始了。



编辑李梅在做编审工作。



编辑部里的“书床”。